

# 大学英语教学与学生社会文化意识的培养

方宗祥

(南京邮电大学 外语系,江苏南京 210003)

**摘要:**海姆斯的交际能力理论认为社会文化意识和修养是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社会文化意识的培养与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形成有着紧密的联系。培养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之一,大学英语教学应针对目前大学生社会文化意识相对薄弱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教学措施,培养和增强大学生的社会文化意识,促进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形成和提高。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社会文化意识;交际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420(2006)03-0052-05

教育部制定的新《大学英语课程要求(试行)》,将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描述为:“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语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sup>[1]</sup>依笔者之解读,较之于前几版教学要求所规定的教学目标,此次突显了对学生“听说能力”及“综合文化素养”的要求。笔者认为此举意义深远,因为许多人的外语学习经验表明,正是“听说能力”及“综合文化素养”的欠缺,导致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低下。这也是我国的大学外语教学在几易大纲或要求后仍无法摆脱的尴尬局面。“听说能力”的重要性早已为教师和学生所普遍认可,并且通过训练是可以提高的;而“综合文化素养”却容易被忽略或至少是不被重视。一个人的综合文化素养体现在很多方面,就大学外语教学来看,主要表现为其目标语的社会文化意识和修养。本文将就大学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社会文化意识和修养的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对大学外语教学有所裨益。

## 一、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社会文化意识的培养是外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其首要属性是社会性,这一点已得到语言学界的认可。伦敦学派

的创始人弗斯(J. R. Firth)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社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语言和社会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sup>[2]</sup>;英国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M. A. K. Halliday)也认为语言应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一种个体现象,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应从社会的而不是从心理的模式中得到解释。他还认为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是两件不同的事,但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在学习中两者缺一不可<sup>[3]</sup>。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D. Hymes)在其著名的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理论中也承认语言的社会性,并认为社会文化意识和修养是一个人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sup>[4]</sup>。根据他的理论,一个人的语言交际能力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能分辨合乎语法的语言形式(grammarality);(2)能分辨实际可接受的语言形式(feasibility);(3)能分辨得体或恰当的语言形式(appropriateness);(4)能分辨一种语言形式的常用程度(Practicality)<sup>[5]24</sup>。

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可以归纳为在交际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是否正确(grammarally possible)、可行(psychologically feasible)、得体 socially appropriate)、实用(actually done)。不难看出,海姆斯交际能力的第一项指的是语言使用者的语言基本功,即对语音、词汇、语法的掌握程度,而另外三项能力都与社会文化因素有关,正是这三种能力决定了语言使用者在交际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是否可行、得体和实用。综上所述,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社会文化意识的培养在外语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大学外

语教学的目标之一就是使学生“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语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即培养其跨文化交际能力。那么大学生的社会文化意识的培养与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形成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

## 二、社会文化意识的培养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系

海姆斯的交际能力理论告诉我们,掌握了交际的第一种能力,即“能分辨合乎语法的语言形式”,只能说明语言学习者具备了“造出意义正确、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的技能”,并不能保证其在实际的语言环境中进行有效的交际。正如海姆斯在《论交际能力》(1971)中指出的那样,“语言和社会生活的结合是一种积极有益的现象,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语言运用的社会规则,不掌握它们,语法规则便毫无用处”<sup>[6]49</sup>。海姆斯在这里所说的“社会规则”就是指在交际的过程中保证言语“可行”、“得体”和“实用”的能力,也即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文化意识和修养。因此,不了解目标语的文化,没有良好的目标语社会文化修养,就无法进行有效的交际。

一个人的目标语社会文化意识与其跨文化交际能力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文化与交际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共同产生,一起发展,关系密不可分。因为交际的载体是语言和文化,而语言和文化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从而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表达(交际);同时交际内容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又受文化的影响而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

其次,跨文化交际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在此过程中,由于交际双方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环境各异,思维方式和交际方式有别,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化冲突,造成跨文化交际障碍。如果交际双方不注意彼此的文化差异,交际时必然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造成交叉误解,导致跨文化交际的信息差,出现语用失误,使彼此间的交流产生障碍,从而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因此,一个人的目标语社会文化意识和修养是其跨文化交际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保证,反之,跨文化交际能力又是其目标语社会文化意识和修养的具体体现。

在具体的语言实践过程中,一个人的目标语社会文化修养和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系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良好的社会文化意识和修养是保

证其语言交际有效的前提和条件。没有良好的社会文化意识和修养,语言使用者就不具备对其所用语言可行性、得体性和实用性的正确判断力,从而必然会影响交际的效果,或词不达意,或令人费解,或使人尴尬,更有甚者会使人拂袖而去,令谈话不欢而散,这样的交际注定要失败。例如,在与西方人交往时,如果你缺乏必要的目标语社会文化修养,就很容易问出一些使人尴尬的问题,如:“Do you go to church?”、“Are you married?”、“What does your husband do?”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当事人的个人隐私(privacy),西方人认为这些问题都“none of your business”,因此,这样的交际,对方是不会予以配合的。又如,中国人在向别人表示关心时,喜欢使用各种劝告的语气,如:“Don't drink too much coffee!”、“You'd better put on more clothes!”等,西方人对这种“关心”并不领情,反而会认为你把他当孩子看待而很不高兴,这样的交际又怎么能成功?。再如,在交际的过程中,西方人善于褒奖对方以示礼貌,他们会不时的夸奖你:“Your English is pretty good.”,如果你缺乏应有的西方文化修养,发扬中国人“谦虚”的美德,来上一句“Oh, no. My English is very poor.”,西方人会大显不悦,认为你在怀疑他们的判断力。如此例子,俯拾即是,可见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文化修养对保证交际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一个人如果具有良好的交际能力反过来会促进其社会文化修养的进一步提高。因为有了良好的交际能力,他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自如地与对方交往,从而有更多的机会融入对方的文化,接受更多的目标语文化熏陶,他的目标语社会文化修养便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

社会文化意识和修养与交际能力之间的这种关系说明:一个人要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具备了基本的语言能力的基础上,还要充分地了解和掌握与语言的使用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知识。因此,教师在进行外语教学的过程中,在讲授语言知识的同时,要注意社会文化知识的输入,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意识,提高他们的社会文化修养。

## 三、大学生语言交际能力现状及其原因

海姆斯的交际能力理论告诉我们,一个人要具有较好的语言交际能力,在具备较强的语言基本功的基础上,还必须具有较高的社会文化修养。那么

中国大学生目前的交际能力现状如何呢?导致其现状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中国学生多半从小学就开始接触外语,经过初中、高中六年的学习已基本掌握了所学外语的基础知识;加之中国学生勤奋好学,再经过大学四年的学习,中国大学生的语言基本功一般都比较扎实。近年来在一些大型的外语能力测试中,如 TOEFL、GRE 等,中国学生成绩优秀已是不争的事实,这说明中国学生对于外语语言知识本身的掌握和驾驭没有问题。然而,他们在面试或初到国外就读和生活时,在交际和表达方面所表现出的“劣迹”也是令人遗憾的。究其原因虽然是因人而异,各有不同,但归根结底都与中国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没有得到良好、系统的训练和培养有关。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他们缺乏目标语的社会文化知识,不懂得在交际过程中遵循“礼貌”或“合作”的原则,而造成跨文化交际的别扭、不适,甚至“文化休克”,导致交际失败。胡文仲(1989)把中国学生在跨文化交际时容易犯的文化失误概括为四类:(1)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是不适当的;(2)从文化习俗上看不可接受;(3)不同价值观的冲突;(4)过于简单化或过于笼统<sup>[7]</sup>。如:一位中国留学生去见导师,敲门后未见动静便推门而入,在室内等候,引起导师的不满,从而导致交际的失败。究其原因,这名留学生犯了上述的第二类错误,违反了跨文化交际中的“合作”原则(尊重对方的生活习俗和社会准则),因为在美国,独处不受干扰必须得到尊重。

由此可见,中国大学生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对目标语的社会文化修养显得尤为缺乏。尽管这一点已引起外语教学界的重视,但多半还是停留在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上,如集训、开有关讲座等类似于“亡羊补牢”之策,并且收效甚微。那么怎样在外语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意识、提高其社会文化修养呢?

#### 四、培养学生社会文化意识的几点思考

如前所述,大学外语教学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的兴起和发展与外语教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西方,社会文化意识的培养已成为大学外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外语教学协会在其编写的《美国外语教学协会关于外语能力标准的暂行规定》中就正式将社会文化素养列入交际能力,并规定交际能力由4种语言运

用能力(听、说、读、写)和社会文化能力(文化修养)两大部分组成<sup>[8 1465-477]</sup>,因此,社会文化意识的培养已成为其外语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在我国的大学外语教学界,虽然大多数从事外语教学的人都认为社会文化知识对语言学习非常重要,可是在实际教学中,目标语文化往往被忽视,或至少被挤到一个相当次要的地位。有鉴于此,基于多年的高校外语教学实践与体会,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社会文化意识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需要语言学习者和教师的共同努力和配合。作为教师在传播语言知识的同时,要注重其社会运用规则知识和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和传播,尤其是涉及到社会习俗、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知识,要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讲深讲透并加以运用;同时,充分调动学生“追根究底”的欲望和兴趣,使有关社会文化知识全方位融入学生的学习之中。这样做比单纯地介绍更为有效。例如,当教师准备向学生介绍有关西方社会聚会习俗时,首先让学生听下列这样一段对话<sup>[9 122]</sup>:

A: Good evening! Good to see you again, Ed?

B: I'm Bob.

A: Of course, Bob Willingham, isn't it?

B: Bob Winter.

A: Of course, I'm sorry. Well, Bob, how is the lumber business these days?

B: I'm in public relations.

A: Oh really? That must be interesting.

.....

听完以上对话后,首先让学生猜一猜该对话可能发生在何种场合,给学生以思考和判断的机会。然后教师加以分析:这种典型的相互交流,清楚地说明这是一次美国晚会标准的朋友间的聚会。教师可以趁热打铁,向学生介绍一些有关美国社交晚会方面的背景知识。如可以告诉学生,在美国这类聚会非常流行,通常将生意寓于娱乐之中,也是进行政治活动、建立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渠道;这类晚会往往带有一种社交气氛,你甚至不需要请贴就可以参加,晚会的主人通常不认识参加晚会的绝大多数客人。所以,晚会上见面时的称呼几乎是一致的,某人会走到你的面前说:“Good evening! Glad to meet you, I'm so - and - so.”你的回答也应该是:“Hi, I'm so - and - so. Nice to see you.”这类晚会的规模不一,小则十人以下,多则三四百人;晚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相互交流、认识,以期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

通过以上的分析介绍,学生自然会在听讲过程中了解有关的社会背景知识,并会不知不觉地融入聚会之中,有身临其境之感,那么这些知识学生就会牢固掌握了。

第二,选准切入点,从一定的角度集中介绍目标语社会文化知识,突出其特点,强化学生对社会文化知识的训练,这样往往会比较有效地使他们领悟目标语的社会文化内涵。如在与外国人进行交际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们在交流思想的过程中总是尽量避免那些简单、粗俗的词语,以掩盖事物不愉快的本质,使其具有一定的美感或更为礼貌,更易被人接受,以满足交际者的利益和心理需要。教师便可以选择交际中的这种语言“美化”现象作为切入点<sup>[10] 183</sup>,从一个侧面集中介绍西方文化的这一特点,同时提示学生注意与之密切相关的语言禁忌现象(linguistic taboo),并渗透到相关领域。如(1)“宗教观念”:在与对方交际过程中,不说不吉利的、不尊敬神灵的话,对虔诚的基督徒(西方人大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要直呼上帝的名字,而用“My God”。(2)“社会习俗”:通常被视为不成文的法律,所谓“入乡随俗”,当人们用外语与对方交流时,就应该遵守这种“合作”原则,尊重对方的传统习俗。如在对待生、老、病、死及相关方面的观念上,使用英语的国家的人们一般都避免使用粗俗词汇和表达法而改用“美化”了的委婉方式。例如:他们一般不说“pornographic books”、“go to the toilet/W. C.”、“old people”、“fat”、“crippled”或“die”,而代之以“adult book”、“wash my hand”、“senior citizen”、“stout”或“go to the better world”。(3)“交际需要”:西方人为了表示礼貌、友善,在涉及到一些令人反感、使人自卑、有伤自尊心的事情时往往喜欢使用“美化”了的语言,如他们说“He is ill-mannered.”、“We allowed him to resign.”、“He is a fashion designer.”、“She is unattractive.”,而不说“He is rude.”、“We fired him.”、“He is a tailor.”、“She is ugly.”。通过上述的介绍,学生会对外方文化中的这种语言“美化”现象有一个较深刻的印象,并会在实际的交际过程中予以注意和运用,从而收到较好的效果。

第三,教师在外语教学过程中要处理好语言文化、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语教学对社会文化因素未予以重视,应试教育等种种原因导致教师在课堂上忙于讲解词的用法,分析句子成分,翻译课文,无暇顾及社会文化知识的输入和交际能力的培养,而实践证明,只有在外语教学

中做到三者相结合才能真正收到较理想的效果。因此,外语教师要提高认识,端正态度,不仅教语言知识,而且要使学生了解这一语言的民族性及其文化,以社会语言学(social linguistics)的基本观点来指导外语教学。

第四,外语教材的编写要注重目标语社会文化知识的系统介绍,并将其融入课文中,使语言知识与文化知识相互渗透;课程设置方面,在开设语言技能课的同时,要兼顾开设专门的介绍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课程,如“欧洲文化入门”、“跨文化交际”等;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发挥主导作用,随时注意社会文化知识的导入,并结合平时的例句,不断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例如:针对问题“Would you like some coffee?”教师随即提供以下选项(a)Yes, please. (b)No, please don't go to any trouble. (c)Thank you. 让学生思考之后得出各自的答案,然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得出正确选项(a)。因为(a)既符合语法规则(回答一般疑问句用Yes或No),又符合“礼貌”原则(please请);(b)虽符合语法要求,但其包含的文化是中国式的客套;(c)很唐突,让提问者不知所措。通过以上解释学生在鉴别中吸取了西方文化知识,当然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第五,加强对学学生课外阅读和课外活动的指导,是促进学生社会文化修养提高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教师在通过课堂导入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有意识、有准备地向学生提供一些介绍西方文化的阅读材料,供学生课后吸收消化。同时,可以组织学生参加英语角、文化专题演讲、文化知识竞赛,英语晚会、英语广播、英语朗诵等课外活动,让学生接触更多的西方社会文化知识,使其融入其中,定会受益匪浅。

## 五、结束语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和高新技术的挑战,外语作为跨文化的交际工具显得尤其重要。大学外语教学肩负着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的重任,而一个人的社会文化修养是其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外语学习者而言,即使有了不少语言知识,若要获得交际能力,还必须了解目的语的社会文化知识。到目标语国家去学习其语言和文化固然是最理想的途径,但对于大多数语言学习者而言毕竟不太现实;因此,创造和改善语言文化环境,培养大学生的社会文化意识这一重任就落在了大学外语教师的肩上。要将目标语的

社会文化知识渗透到外语教材和课堂中去;在课程的设置上要注重目标语文化知识课的开设,尤其是外语教师要做到在教学中把认识和掌握目标语社会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意识、提高其社会文化修养作为主要教学任务之一,并不断地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社会文化知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失时机地、有针对性地传授社会文化背景知识,提高其综合文化素养和语言交流能力,从而真正实现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

####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2] Firth J R. Man and Culture: An Evaluation of the Work of Bronislaw Malinowski.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7.
- [3]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 [4] Hymes D H.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Brumfit, Johnson.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UP, 1970.
- [5] 戚雨村. 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6] 祝晓瑾. 社会语言学译文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 [7] 胡文仲. 英语的教与学.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 [8] 盛炎. 语言学原理.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0.
- [9] 施心远. 美国社会百态.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7.
- [10] 吕文斌. 外语教学与研究论文集(续). 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7.



**作者简介:**方宗祥(1965 - ), 男,安徽芜湖人。南京邮电大学外语系讲师,文学硕士。从事语言学理论研究及英语教学工作。

## On Culture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e Education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FANG Zong-xia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03, China)

**Abstract:** In hi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Hymes holds that culture consciousness and nurturance contributes greatly to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Culture nurturance of the students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formation of the students'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which is known as one of the major targets for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Therefore, effectiv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develop and improve the students' culture consciousness with the aim of stimulating the 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ir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Key word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culture consciousness;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